

对于汉语小说现代性生成过程的扎实考察

《语言变革与汉语小说的“现代”生成》序

□钱振纲

《语言变革与汉语小说的“现代”生成》的作者陈迪强 2007 年至 2010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时,我是他的指导老师。他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考察清末至五四小说语言变革方面的题目。毕业后他去了大连外国语大学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转眼 10 年过去了,凭借刻苦和聪明,近些年迪强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在他在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扩充完成的《语言变革与汉语小说的“现代”生成》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很为他高兴。

鲁迅在其学术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汉语小说的古代史作过具有奠基性的论述。汉语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和传说,六朝志人志怪是早期小说的主要形态。唐代是汉语小说的自觉时代,小说从逸史中分离出来。这是汉语小说的第一次大变迁。宋代白话小说的出现是汉语小说的第二次大变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论述内容截止于晚清的谴责小说。之后汉语小说又发生了第三次大变迁。在这次大变迁中,汉语小说结束了文白并存的局面,以崭新的白话语体和崭新的思想和艺术面貌,从古代形态过渡为现代形态。

对于汉语小说的古代形态和现代形态,学界的研究成果都已经相当丰富。然而对于汉语小说自古代形态进入现代形态的过程即汉语小说的第三次大变迁的过程,研究成果却相对薄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是文学史断代的影响。很长一个时期,学术界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时代。这种“四分法”断代观点形成的学术分工,无形中干扰了学者们对于清末至五四这一过渡地带的包括小说变革在内的文化变革进行前后关联的深入考察。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代的“两分法”断代观点逐步占了上风,学界对于清末至五四这一时期文化变革的连续性的研究有所重视。但文学与语言的科分这一干扰因素仍然阻碍着学者们着力从语言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从这个角度看,迪强的这部著作的选题是一次成功的“突围”。这一“突围”显示了作者的学术眼光和勇气。

该书的一个特点是体系的完整性与涉及问题的广泛性。前四章按着清末、民初和五四三个时段历时性地研究汉语小说的现代性“变法”。第一章在明确古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文白并存以及各自的美学特征的基础上,以清末白话文运动和小说界革命为背景,考察了当时白话小说的倡导和创作。第二章考察民国初年文言小说的回潮及其原因。第三章、第四章考察了五四时期汉语小说在语言、思想、艺术上的巨大变革。第五章对于汉语小说的断裂性和连续性进行了思辨性讨论。在论述过程中,涉及到许多重要问题,如方言小说在清末的兴衰、文言小说在民初的回潮和在五四之后的逐步消逝、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密切关系。作者对于这些问题都作了认真的研究,结论令人信服。

第二个特点是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过去人文学科习惯于举例的方式提供论据,从而进行定性分析。这种定性分析说服力是较弱的。该书作者一改传统,定量地呈现了清末至五四前后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在数量上的消长。这就使所作论证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当然,进行这类统计是需要作者付出较多时间和精力。

第三个特点是材料丰富,富有对话精神。该书分析到的自晚清时期至五四时期的小说相当多,其中不仅有白话小说,也有方言小说、古本小说和骈体小说。同时引用了各个时期不少的相关评论。对于当代有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在绪论中有综述,论证过程中也不忘与之对话。这也都增强了该书的学术分量。

迪强的这部著作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对于清末至五四这一时期汉语小说的现代生成亦即汉语小说第三次大变迁的考察任务。这是很有意义的。这部著作对于汉语小说研究有不小的推进作用,值得学界关注。

借助 5G 传播,发展新时代的文化事业

□张慧瑜 陈昱坤

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对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工作从战略和全局做了新的规划和设计。文化建设不仅需要把握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条主线,也要回访新中国革命史、建设史、改革开放史所开辟出来的文化经验,解决好文化载体、主流价值传播的问题,运用现有的媒介技术与文艺市场的繁荣,不断挖掘出具有人民性和现实性的文艺佳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艺术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人民艺术工作者,他们书写人民经验、反映群众生活,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其次,发展新时代的文化事业,文艺创作要重回人民性的传统,创作者眼睛要向下,担负起人民生活观察者、记录者的社会角色。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现实主义不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专业名词,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表现形式。很多文艺工作者为了反映真实的群众生活,善于对人民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入研究,无论从对话形式、动作设计、场景展示等都完全复现了群众的真实样貌,这样的作品必然携带着鲜活的人民性特征。近几年涌现的主流电影如《流浪地球》《夺冠》《我

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不仅叫好,而且叫座,就是因为这些电影专注于主流价值之下的民族情感叙事与艺术创作的结合,表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小康、脱贫攻坚等时代命题,塑造了互文性的文化与政治想象,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在今日,无论是支撑文化生产的技术,还是传播的媒介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 5G 通信技术的全面铺开,现有的媒介传播格局也面临重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新型主流媒体是切合当今网络生态的主流媒体,5G 使得信息文化传播速率呈现指数级上升,结合 5G 时代的信息传播特点,文艺创作也需要创新。5G 技术是全媒体发挥效力的基础,加快全媒体工程建设,让人民群众更加关注媒介的沟通互动功能而不是单向传播功能,媒介应该诉诸于对人民群众生活场景的关注并及时进行信息反馈,塑造全媒体在新时代的文化记忆。

在 5G 传播的模式中,速率为“不是问题的问题”,媒介本身成为“去媒介化”的隐没要素。中国革命建设中善于一定的媒介形式传播信息与文化,如黑板报、宣传栏等,都是服务人民群众的基层传播媒体。新中国建设中也对媒介进行了参与式改造,鼓励人民群众用各种“就地取材”的媒介,创作丰富多彩的群众文艺。在新时代,5G 智能传播让技术反哺媒介,使技术本身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一传播向度,让用户、使用者更容易参与到媒介生产中,使得

媒介运行的重心由在场实体转向云端,只要嵌入虚拟程式与云端数据人们就可以开启自主传播,如乡村滚动大屏与广播系统可以绕开烦琐的电缆搭建与大城市基站实现数据互通,智能化产品更广泛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自主传播的信息终端,这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要使文化传播发挥最大效益,离不开我国近年来重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尤其是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建设。我们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与尖端移动通信技术的作用,利用好网络时代的传播形式,如互联网短视频是贴近群众的文化生产平台,低门槛的注册与生产机制满足了群众的表达权利与书写权利。借助移动技术的支撑,纪实、即时的、大众的短视频是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不可或缺或稀缺的维度。

短视频起初的构想本应是人民群众的和普惠的,然而在其实际商业化发展过程中,短视频平台对于用户个体在平台空间显影的机会并不均等,用户的价值重新回到了以流量数据为标度的盈利个体,未能跳出商业的发展逻辑。有些短视频成为塑造身份对立、品位区隔等商业化逻辑的代表物,之所以会有对于一些短视频“土味”“蹭热度”“网红”等指认,是因为网民在诸如城乡、性别等二元对立结构中呈现出巨大的话语连续性断裂,土味短视频成为城市窥探农村生活的媒介瞬

间。互联网平台在激发用户创作活力的同时,也将内容端的分发权完全以算法逻辑助推,而没有考虑到受众的众多差异化因素,其中的分拆和传播权力被互联网中的专业化博主利用,以积累个人舆论热度,在文化传播与基层的空隙间恣意生长。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现象,中国的互联网产品不应被算法绑架,要兼顾社会和公共效益。

另外,短视频本身是现代媒介技术运用的下沉,基层群众对于摄影、摄像、录制与剪辑等现代技术手段的掌握并不容易自发习得,这需要基层文化工作者承担起文化传播的职能,扮演由城市向乡村逆向流动的“知识扶贫”的角色。文艺工作者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协助基层群众进行网络内容创作,在基层教育中普及基础的网路内容生产知识和影像媒介、社交媒体的传播原理,做好新时代的“数字扫盲运动”,而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也不仅是物质水平、基础设施层面,更应从文化层面打破二元对立的区隔,这需要焕发基层的、乡村的文化活力。在中国媒介技术高速发展且已取得世界性成就的今天,我们需要把新技术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结合起来,发展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传播模式,更加普惠式、均等地实现文化事业发展,这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

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新时期鲁迅文学院发展概述

□陈 帅

1978 年,中国作协恢复工作,两年之后,“文学讲习所”得以重新启动。1984 年,经中宣部批准,“文学讲习所”正式改名为“鲁迅文学院”。这一创举,使得这所中断了 27 年之久、以培养作家为宗旨的教学机构重新焕发青春。由此开始,鲁迅文学院找准了自身定位,戮力创新,踏实笃行,坚定为国家培养文学人才的办学目标,强化为社会凝铸文学精髓的责任道义,在 80 年代文化复苏勃发、90 年代经济大潮冲击以及新世纪多元精神激荡的时代脉搏中,站稳脚跟,明确方向,用数十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在教学发展与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总体来说,鲁迅文学院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极具特色,既稳又快,既重传承又求突破,在班次设置、教学安排、学院建设管理等方面,践行着一直以来坚守的“培养文学新生力量,壮大文学队伍,繁荣文学创作”的教学方针,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贡献着极为重要的力量。本文聚焦鲁迅 1978 年至 2012 年的发展情况。

班次设置

从 80 年代举办的各类作家班、进修班肇始,到 2002 年开始举办的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高研班),鲁迅文学院的班次设置一直体现着其办学的高规格性和专业性。鲁院通过研修班和高研班的举办,聚拢了当时最为优秀也最为迫切需要学习的中青年作家,通过邀请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专家为其授课,为文学界输送了大量的文学人才,也先后成就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文学名家。王安忆、朱苏进、赵本夫、石舒清、温亚军、麦家、红柯等等,这样的名家不胜枚举,他们不仅获得了茅奖、鲁奖等权威奖项,也薪火相传,多担任各级作协机构的重要职务,将培养文学新力量的责任使命不断践行并传承下去。

鲁院班次设置的专业性还体现在鲁院对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文学人才培养的关注和兼顾。从鲁院定名前夕的文学讲习所,到后来的高研班,鲁院一直注重不同群体和不同类别班次的设置,比如少数民族班、编辑班、评论班、英语班,还有随后和各个地区合作的省市地区班,和行业合作的公安班、地矿班等等。此外,从 2009 年开始,鲁院开始了网络作家班的设置,加大对网络作家的培训和指导力度,从而更好地助力网络文学发展。经过上面的梳理,不难看出,鲁院在班次设置上注重对基层地区、各行各业最广大作家群体的重视和培养,注重因材施教,因时制宜,始终根据时代需要去灵活增设必要的班次设置,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去量身定制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安排,以系统化、专业化、为纬,两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鲁院的教学效率和培训质量,而这些也成为鲁院办学特色一以贯之的体现。

从实际出发,以学员为主,不断开拓办学思路,不断完善教学计划是鲁院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新世纪以前,鲁院的长期研修班无法获得教育部授予的学位和学历,没有学历,则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作家前来学习。为了向国家高教体制看齐,也为了更快地向正规化发展,鲁院开拓思路,举办了一系列时间短,但教学规格仍旧很高的进修班、研究班、培训班。从实际出发,鲁院考虑到作家队伍的时间情况和内在需求,通过短期班的形式,节约了受训学员的时间,也消除了大家对学历的要求,从而在教学实践中提升了大量作家。除此之外,为了解决鲁院无法授予学员学历的问题,鲁院于 90 年代前后和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进行合办研究生班,与首都师范大学合办大专班,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学员对于学历的需求。这些尝试,既满足了学员的学习要求,也为文坛培养了一批举足轻重的名家,如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人,都曾经在鲁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过。

与此同时,在八九十年代,为了向更广大的作家服务,鲁院常年举办函授班,通过将鲁院授课内容和教学资料邮寄函授的方式,每年培养学员有数千之多。以此为端,鲁院开展了对文学爱好者长达 20 年的培训,这一班次设置,扩大了鲁院的教学影响,也让更多的作家群体从中受益。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鲁院在教学安排和班次设置中,一直秉持着科学性、全面性和社会性的原则。这些原则既有社会历史的影响,更多的是建立在鲁院对学员学习负责,对教学工作

严谨认真、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通过这些措施,鲁院的教学成果和社会影响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教学安排

如果说班次设置是鲁院教学成果得以不断发展提高的外在保障,那么教学大纲的不断革新,教学内容的科学安排便是鲁院保持教学特色,奠定文学地位的核心缘由。有别于一般高校文学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研究性,鲁院的课程安排更着重于问题性、针对性、全面性和对文学本质和创作核心的探讨和讲授。

鲁院的课程安排始终将政治理论学习和国情时政教育放在首要位置,用深刻的政治理念来充实武装作家的头脑,以对社情、人民群众的深入理解和体察来塑造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文学课程设置方面,鲁院一直以问题导向为课程安排标准,注重有效的激荡和启发,避免生硬的灌输和讲授。为了保证课程的效果,鲁院邀请全国相关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家为学员进行专题讲座式的授课,确保教学质量达到国内最高水平。经过不断的摸索实践,鲁院的课程安排不断丰富完善,并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门类方向。这些门类从大的方向划分,有国情政治、文学创作与文化理论、艺术鉴赏、作品研讨、社会实践与读书创作等等几大类。

这几大门类在不同时代有细微的差别和侧重,比如在 80 年代,课程突出对苏俄文学的讲授,强调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侧重对文学史和古代文学的普及教育;在 90 年代则侧重对西方文学思潮的讲解,对当时文学现场、小说思潮与流派的跟进和分析等等。总的说来,鲁院的课程设置总是站在时代最前沿问题的思考之上,紧贴文学思潮和社会实际,用丰富而又新锐的课程内容对学员予以最切实和最深入的启发。

除了这些常规课程安排,根据不同的班次类别和学员层次,鲁院还会专门邀请契合的专家对学员进行针对性的课程指导,比如少数民族班、编辑班、翻译班等等,因班制宜和学员层次不同,其课程安排都会根据客观实际,邀请与之相关的专家学者,向学员讲授最有帮助的内容。

新世纪之后,鲁院的课程安排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主张三分之一时间授课,三分之一时间研讨和辅导,三分之一时间自学、创作与社会实践,从而为作家提供一个空间,使他们有时间系统地思考问题。与此同时,鲁院还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师人才库,壮大教师队伍,聘请国内最具实力的学者、专家、作家来院授课,聘请权威专家做客座教授,邀请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做学员的创作导师等等。王蒙、谢冕、钱理群等作家、评论家都曾经常来鲁院授课,从教学人才上保证了鲁院教学内容的独特性和鲜活,为学员在校的学习和创作提供最强劲的动力和保障。学员在完成创作后,鲁院还会组织学员研讨,邀请编辑前来改稿,通过思维碰撞的方式,直击创作现场,帮助学员快速提升并推荐发表。

学院建设管理

在这 30 多年间,鲁院的发展蒸蒸日上,屡创佳绩,在中宣部和作协的关怀和支持下,在鲁院全体教职员工的不懈努力下,鲁院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不断实现着提升和飞跃。

硬件方面,鲁院的办学环境和教学条件得以不断完善和发展。80 年代初,鲁院的办学主要以租用外界房屋为主,没有自己的固定校址,常年处于流动办学的处境,这对学校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保证都有一定的不利影响。1986 年,经由鲁院的争取和多方的支持,新校址终于在三里河落成,从此,鲁院开启了辉煌办学的历史新篇章。此后,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壮大,办学层次的不断提高,鲁院于 2002 年对三里河校区进行了彻底的翻建和改造,教室的电教化、多媒体化,宿舍的单间划分和卫生间配置,食堂的改善以及院内环境的美化和绿化,增添健身器材,扩充图书馆藏书量等等,从方方面面提高鲁院的硬件配置,以应对新形势的教学要求。2010 年,鲁院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了芍药居校区,以进行日常办公和高研班的教

学。此后,鲁院划分为八里庄和芍药居两大校区,两处分别负责不同的教学任务,这一创举,不仅壮大了鲁院的规模,也推动了鲁院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除了在硬件上的改造升级之外,鲁院在教学机构的设置改革、教师干部的教育培养、教学思路的创新提升等软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办学层次的要求,鲁院始终紧贴客观实际,紧贴学员成长需求,对教学机构进行精简优化,对教学思路进行时时更新,注重对教师队伍专业研究的敦促和升级,从根本上保证鲁院的教学质量和学员的学习效果。

文学讲习所时期,鲁院的教学机构只有创作室和理论室两个部门,一个负责创作指导,一个主攻理论研究,很多时候教师既要负责行政事务,又要参与日常教学,这既消耗教师精力也影响教学质量。到了 80 年代,为了适应教学需要,也为了各司其职,让教师队伍学有所专,教有所长,集中精力进行教学工作,鲁院不断健全完善组织架构,成立教务处(包括教学安排、函授班、整理讲义等工作以及专职班主任)、教学研究室(文学讲师)、行政办公室(行政办公),此后,为了更好地辅导学员创作,鲁院还成立了教学辅导室。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函授教学的规模不断扩大,为了抵制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也为了更好地服务作家,鲁院专门成立了函授部,以完成函授工作的相关工作。1996 年,为了解决部门林立、工作重叠等矛盾,鲁院进行机构简化合并,教研室、教学辅导室、教务处合并为教学部,主要负责一般的长期教学;函授部改名普及部,负责函授教学和短期培训。本次机构的精简,在新世纪后一直沿袭,因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后来教学部改为教研部,主要负责高研班教学,普及部改为培训部,停止函授教育,主要负责网络文学、行业班、地区班等短期培训。至此,这两个部门作为鲁院的主要教学机构一直延续到现在,为鲁院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除了机构精简,鲁院在教学思路上也不断与时俱进。秉承培养文学力量、壮大文学队伍的初衷,鲁院始终以培养作家、服务作家为办学核心,不光注重对学员的课程讲授,更注重对优秀学员的创作指导、作品研讨和推荐发表,帮助学员不仅在课堂之上学有所得,还能在随后的创作实践中获得跟进关注和出版发行,使学员在创作上获得更加全面的助力。这些安排和设置,不仅是鲁院人才培养和教学规划合理化、人性化的体现,也是鲁院的学科建设和教学管理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典型成果。

纵观鲁院新时期以来 30 余年的发展,其在班次设置、教学安排、学院建设管理 3 个方面,站稳脚跟,大步向前,形成了很多极具鲁院特色又契合中青年作家发展成长需要的教学经验。无论是 80 年代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还是新世纪后办得有声有色的高研班,鲁院都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并输送了一大批极具分量的作家。鲁院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中国作协等机构的政策扶持和大力帮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成就就是建立在鲁院时刻明晰自己为人民培养作家的办学定位、积极学习党的政治理论指导、践行党的相关文艺政策之上的。以此为基,鲁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紧贴社会现实的办学理念,用极其专业的文学素养和满腔热忱的教育理想,去尝试、去突破、去创新,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注重读书和创作的兼顾,强调研讨和争鸣的激荡,通过丰富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教学思路和培养方案。这些发展成就,为鲁院日后的不断壮大积攒了充足的方法指导和现实经验,也对鲁院的日益繁荣和中青年作家的提升进步提供了不竭的力量之源。

